

薛福成与郑观应近代职业教育思想之比较

余龙生,王楠

(上饶师范学院 史地系,江西 上饶 334001)

摘要 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深刻变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职业教育问题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下被提上历史日程。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薛福成与郑观应,分别从目标论、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阐述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当今发展职业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 薛福成;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比较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08)31-0077-03

薛福成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在考察西方后萌生的,向西方学习是其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与薛福成亲历西方不同的是,郑观应在长期的工商业经营实践中,认识到各种专门人才对实业发展的重要性,主张结合中国国情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为我所用,逐渐形成了从商战到学战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二者关于职业教育的见解,均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一、关于职业教育目标论的比较

关于职业教育的目标,薛福成主张经世致用。鸦片战争后,中国教育仍然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主张经世致用的薛福成认为科举教育机制培养出来的是一群学与用、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呆子,这些“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1]的读书人只能成为封建体制下的奴才。“若谓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2]这种陈腐的制度毒害了一代学风,腐蚀了一批又一批读书人。落后的科举制度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阻碍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引入与传播。若不改革旧的科举制度,中国富强则只能是幻影。

1890~1894年间,薛福成奉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亲身经历让薛福成清醒地看到学校的兴盛是西方发达富强的根基。他详细考察了西方大中小学,对西方职业教育尤为关注,“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非仅为

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3]229}为此,他建议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开设“兵工学校”、“水师学校”、“制造学校”、“农桑学校”等新式专门学校,以发展中国职业教育,促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

郑观应则从长期从事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经历中体会到,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新式人才是当务之急。他认为西方国家富强在于工商业的发达,主张以“商战”对付西方。他在经营工商业实践中发现,中国近代工厂中产品质量低劣、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事故不断等问题,都与没有大工业需要的熟练工人直接有关。对近代机器工业必不可少的初、中级技术管理人员同样也极度缺乏。当时普遍的做法是从国外聘请洋匠、洋技师,但由此引发的问题十分严重。首先,长期依赖洋人不利于国防,不利于民族工业发展。其次,洋匠洋师费用尤高,长此以往,不堪负担。第三,洋匠洋师依仗专善某门技艺,漫不经心,不负责任,飞扬跋扈。第四,洋匠洋师不肯传授其专门知识技能给中国人。这种被动的局面使郑观应认识到培养本国专业技术人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为了打破人们陈腐的传统观念,重视西学,郑观应认为必须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他说:“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4]郑观应认识到广开学校及设技艺、

收稿日期 2008-09-06

作者简介 余龙生(1969-)男,江西鄱阳人,上饶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机器、格致书院是中国致富之急务,非此不足补救万一。职业教育是向西方学习的重点,仅仅学习西方练兵将、制船炮用来与西方兵战还可以,但只能治标,只有学习“泰西士、农、工、商之学”,才能“裕无行之战以固其本”。^{[5]344} 因此,广设职业学堂,令学生各专一艺,精艺求精,自然会人才辈出,日益富强。

在各类职业学校中,郑观应认为有关工业的教育最为关键。他主张在全国各地遍立机器学堂,培养制造使用机器的工匠。他建议广开艺学,竭力讲求,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选本国聪颖子弟入学学习,延西方名师原原本本悉心教授,待以有年,则必出现器物日备,制造日精的局面。那时,“以之通商,则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诸宫中也。”^{[15]512} 可见,工艺学堂的创办、新式人才的培养真正是国强民富的根基。

薛福成通过考察西方国家,看到了西方国强民富在于工商业的发达,工商业的发达在于专门学校的建立、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样郑观应也认为职业教育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点。不同的是一向主张“商战”的郑观应在自己办实业的过程中发现,中国近代大工业中缺乏熟练技术工人、初中级技术和管理人员,聘雇的洋匠洋师危害又巨大,这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只有兴办自己的专门技术学校,培养自己的实业人才,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薛福成在热情详实介绍西方职业教育时,并没有注意到西方职业教育是西方发达工业催生的结果,中国极为弱小的近代工业,并不能吸纳大量专门人才,事实上,由于他的早逝,也没有亲自参与办学实践。但在国人思想陈腐的当时,这无疑具有启蒙作用。而郑观应长期办理实业,在研究西方职业教育的同时,更着眼于中国的实际国情,亲自参与近代职业教育工作,他的做法无疑比薛福成更有现实意义,应该说提供给我们的借鉴会更多些。

二、关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

薛福成在出使考察中发现,西方诸国所以能“骤致富强”,在于技术人才的专业化。西方各国的行政管理人员,从事外交的,“数十年不改其用”,任军政职务的也相对稳定,“数十年不改其术”,不像中国那样“迄无定职”,“迄无定居”,“迄无定官”般地随意调来调去,故能培养出精通业务、胜任职守的行政管理人员;至于科学技艺方面的人才,在“特工为体”的西方国家,不但得到高度重视,而且有着明确的分工,“或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不相撓也,不相扰也。”他还看到西方国家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各自有着严密的分工:“士之所研,则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百种,至累世莫殫其业

焉。”^{[6]422} 在薛福成看来,西方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视,对人才培养的力求专业化及其严格分工,正是西方世界“骤致富强”的奥秘所在。

郑观应从自己长年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实践中认识到,为了适应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业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必须超常规培养技能之才。他在1896~1897年创办汉阳铁厂期间,在实际管理中深感技术人才不足,遂建议由铁厂创办一所结合机器生产的学堂。他设想招收的学生采取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半工半读的形式,“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认为这种“就局之厂之机器,可即事以指授”的教学方式,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预言数年之后铁厂必能人才济济,非但本厂“无籍外募,即各处局厂亦可调用”。^[7] 为此,他亲手制订办学章程六条,其中规定:开始创办时招收学生四十名,以二十名学熔炼,即学炼铜、炼铁,兼学化学;以二十名学机器,即学重学、机器、绘图等。他说:“如蒙准行,将来汉厂不必借才异域,于大局关系诚非浅鲜”^[8],并称此为“东半球未有之大学堂,真非常不朽之功业也。”^[7] 他还主张选派有实际经验的工匠去外国机器厂留学,学成回国后就任学堂教习。

显然,同薛福成亲历西方,对西方有全面系统认识不同的是,郑观应并没有这样系统的理论认识,热衷于工商业经营的郑观应只是在办实业中遇到人才的缺乏,很难找到办实业需要的专门人才,而这些精通技术的专门人才正是近代机器大工业所必需的。薛福成通过国外考察从理论高度上认识到专门人才的重要性,而郑观应是通过办实业从经验的角度体会到了专门人才的紧迫性。两人在专门技术人才培养上的见解虽是殊途但也同归,他们对人才的特殊重视和设想的培养方式仍值得重视。

三、关于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比较

当中国的士人学子们还沉醉在科举制的桎梏下时,西方近代教育已培养出了大批科学实用人才,并形成了完备的近代体制。薛福成在考察中看到西方国家完备的人才培养体制:“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罪其父母。男固无不入学堂,女亦无不入学”。不仅一般孩子可以学习,像残疾者、孤儿等同样可以接受教育。从中央到乡村分别设有大、中、小学,以供学生们选择就读,同时设有各类专门学科以供有志者深造,“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3]229} 中国只有建立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近代教育机构、制度、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御侮自强的目的。

郑观应在研究西方各国学制时,发现德国最为完备,“其学堂自乡而城、而郡、而都,各有层次。”他以各类学院的学习年限、入学条件、班级制度、如何

衔接、学校数目、经费来源等方面,勾画出了一幅较完整的西方近代学制,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西方近代学制,提出了中国的近代学制。

郑观应参考西方近代学制并考察中国国情,设计出了中国的近代学制,他说:“窃谓中国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者为中学,设于省会、京师者为大学。”他认为,在这些学校中,文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武分为陆军、海军两科,各有规定的学习范围。至于具体的组织形式、学习年限、衔接方法,“每科必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降。详订课程,三年则拔其优者,由小学而中学。又三年拔其优者,由中学而升大学”。并规定学生必须在文、武中所学的科目里任选一科,专心学习。而在小学以下,他提出:“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无论贫富皆可读书习艺。”^{[5]130}

同薛福成对近代学制的倡导相比,郑观应不仅更加详细、深入地介绍了西方的近代学制,更为重要的是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较完整的中国式的近代学制。这无疑比起单纯的对西方学制的介绍更为可贵。尽管是出于改革的迫切需要,他所设计的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松散的初等教育为基础的专门教育学制,以今天的学制理论衡量有许多不足;尽管他在对学制的设计中未能摆脱科举制的束缚,将科举制与学制相混合,但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个较完整的近代学制。

相比较而言,薛福成的学制思想没有联系中国国情,这使其在中国实施的现实性不足,但是他建立近代教育体制的某些主张被后人所接纳,起到了社会启蒙作用。郑观应侧重中国现实的需要,要求改书院为学校、广设新式学堂,在当时不失为一种

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特别是他设计的各级学校组织形式、学习年限、衔接方法、考核制度等,并注意到了初等教育的发展。这就使得他设计的学制所具备的近代学制特征更加鲜明。

总之,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初期,薛福成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职业教育,由于中国国情,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并不能在当时得到真正实现。郑观应在办实业过程中,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更大程度上是西方职业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嫁接的产物,尽管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职业教育,但对后世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强调职业教育要注重实践操作。应该看到,薛福成与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探索者,从不同的侧面勾画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向。

[参考文献]

- [1]朱有豫.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223.
- [2]徐素华.筹详刍议[M]//薛福成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60.
- [3]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4]郑观应.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61.
- [5]郑观应.盛世危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6]丁凤麟,等.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7]陈旭麓.郑观应致盛宣怀拟设钢铁冶炼学堂说帖(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C]//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8]陈旭麓.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C]//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Comparison of Moder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deas between Xue Fucheng and Zheng Guanying

Yu Longsheng, Wang N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Shangrao Teachers' College,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growing of national crisis,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Vocational education had been put on the agenda of history in a new social environment. Xue Fucheng and Zheng Guanying who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bourgeoisie of early modern China expatiate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goal, personnel training model and education system,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historical revel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day.

Key words :Xue Fucheng; Zheng Guany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arison of thoughts